



新业态劳动者的自我书写

——当代文学与劳动诗学的新向度

□王翠艳



近年来,新业态劳动者群体通过文学创作进行自我书写,表达劳动经验,不仅在自媒体平台引发强烈共鸣,同时也获得了传统出版界的认同与接纳。对这一群体的写作经验与美学意义的发掘,对于透视当代文学与数字时代劳动诗学的新向度与新趋势,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具个体反思的严肃文学属性。当然,新业态劳动者自我书写或许也可以纳入当前另一流行术语“基层写作”范畴,但基层写作涉及范围广、书写内容和主体更为多元,新业态劳动者则以书写自己的职业生活为主体内容。在这个意义上,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。

“日常劳动诗学”与平台劳动的文学呈现

新业态劳动者文学书写的意義,不在于其提供了圆融精致的审美文本,而在于其建构的“日常劳动诗学”使劳动回归文化表达的中心位置而参与了社会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。

尽管王计兵、胡安焉的作品中不乏回忆亲情与成长经历的文字,但外卖员、快递员的职业细节始终是其写作中最具价值的部分。正如王计兵第一本诗集的名字“赶时间的人”所象征的,受制于平台算法的成本控制和效益追求,时间的紧张始终是新业态劳动者写作中的核心意象。“闪电”“呼啸的风”“奔走的秒针”“走失的秒针”等意象在其诗作中频繁出现;“赶时间的人”“赶单”“下午三点”“不等了”“奔跑的蓝”“午高峰没空打架”“一个用速度生活的人”“洒血与洒餐的速度PK”,类似诗题更是令人产生一种极度的紧迫感。在送单一单件与收入直接挂钩、超时就要罚款的平台管理机制下,外卖员“像是一个被时间追赶/慌不择路的小偷”(《不等了》),“从空气里赶出风/从风里赶出刀子/从骨头里赶出火/从火里赶出水”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(《赶时间的人》)。胡安焉的《我在中国送快递》则用非虚构手法,用大量细节讲述快递员习惯“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,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”的过程。这种职业生活的“审美化”再现,呈现的不仅是个体的生活经验,同时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标本与切片。

在记录职业劳动的同时,新业态劳动者也在写作中表达了对劳动状态的理性思考。王计兵用“浩浩荡荡的蚂蚁/在大地的裂缝搬运着粮食和水”比喻快递员劳动的渺小与忙碌,同时也用“我们不是软骨头/我们只是带着母体最初的温度和柔韧”赞美快递员生命的韧性。作者用诗句调侃自己的境遇,他将人们在菩萨前许下的心愿比作“订单”,“我想菩萨也会/超时、洒餐、按错门铃/弄混了订单/只是不知道/菩萨会不会收到/投诉和差评,扣分和罚款”(《菩萨一定是辛苦的》),字里行间有一种混杂了无奈与豁达的幽默。对于在工作中的“失名”状态,诗人也会发出温和的抗议:“我不叫兄弟/兄弟在别的城市……我明明一动未动/名字却跑丢了/你可以叫我:上一个/也可以叫我:下一位”(《请叫我王计兵》)。与此类似,胡安焉也在以白描手法记录劳动细节的同时,表达对职业生活的反思。其将自己比作“工作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”的自嘲,以及在快件丢失后认为自己“精神上再也爬不起来”的挫败感,都展现了劳动日常中的困境。只是与传统打工文学的悲情色彩相比,他们的基调更为平和,也具备了更复杂的审美张力。

“低处飞行”与个体微观体验叙事的价值

王计兵将自己的第三本诗集命名为“低处飞行”,这四个字既是对外卖员在物理空间的“低处”高速穿行的职业生活的具象化,同时也是其虽身处社会“低处”精神也要“飞行”的宣言。无独有偶的是,胡安焉同年出版的第三本书也被命名为“生活在低处”。这种在“低处”平视生活的视角及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深度挖掘,呈现出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本所不具备的真实性与情感性。对比知识分子型诗人王二冬的《快递中国》对快递行业的宏观书写:“一个个快件如横平竖直的汉字/用每一次穿越山河与风雨的抵达/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/书写着新时代的速度与温度”,王计兵、胡安焉等人的个体微观写作更具叩击人心的力量。这种书写既是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忠实记录,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文学回应,彰显了文学与社会对话的独特价值。

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,我国包括外卖配送员、快递员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。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、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群体,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。2020年9月《人物》杂志发表“爆款”文章《外卖骑手,困在系统里》记录平台算法对外卖员的“压榨”;2024年7月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孙萍出版《过渡劳动: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》呈现外卖骑手劳动的“悬浮”与“过渡”状态。新业态劳动者在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书写,则深刻揭示了算法压力如何内化为劳动者自我规训的心灵细节。这不但在个体情感层面与新闻报道的事实呈现、学术著作的理论抽象形成互补,同时也对平台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做出了更具力度的批判。

更为重要的是,新业态劳动者通过自我书写,实现了对被算法控制的劳动异化的精神抵抗,并由此完成了对自我生命主体性的建构。外卖员王计兵将“写作当作寻找人间的补丁”,称“把一块块补丁连接起来,连接成一件一件的百衲衣,可以为人间遮风挡雨,可以抚慰内心,可以让人变得沉稳、平和、善于容纳”(《骑手的春天》);快递员胡安焉将“写作”视为“亲近和向往美的途径”,在写作中“渐渐看清楚真实的自己,并反省自己,也学会了肯定和爱自己,并由此通往内心的平和、坦荡、充实和满足”(《重建自我认同》)。货车司机牛二哥在万籁俱寂的午夜将灵感固化为“清秀绝伦的花”,并把这一刻当作疲惫一天中“最幸福、最惬意的时刻”(《一名货车司机的写作之路》)。写作之于他们,既是疲惫生命中的英雄梦想,也是体味与消化生活、辨认与接纳自我的有效方式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不久的将来,也许有更多的新业态劳动者加入他们的行列。

[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,本文为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“职工文化与劳动传播研究”(24JSTD003)的阶段性成果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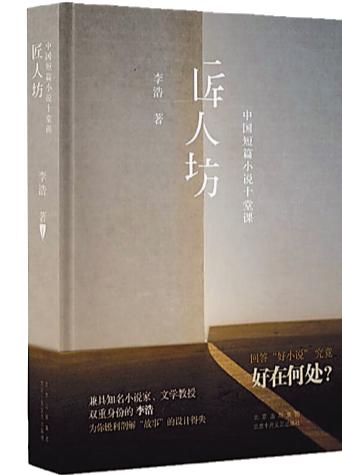
■第一感受

李浩的文学创作从诗歌出发,进而成长为“70后”小说家中的翘楚,近年来发表大量文学理论和批评作品。在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任教,身处学术体系之余,他又始终活跃在文学现场,参与多个当下文学热点话题的深入讨论。这种“叠加”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《匠人坊: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》与《匠人坊:小说技法十二讲》。

《匠人坊: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》中收录了十篇文章,分别是对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莫言、余华、史铁生、王小波、白先勇、残雪和东西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的阐释和剖析。这是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,李浩借鉴了法国批评家阿尔贝·蒂博代的“作坊式”批评理论,从创作者角度出发深入文本内部,拆解其结构、语言、情节、视角等技艺层面的设计,解密那些小说名家在写作中施加的“魔法”——如何巧妙地运用各种叙事策略来实现叙事目的,如何做到不着痕迹、浑然一体的文本效果。这本书不仅展现了李浩对文学技艺的深刻理解,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视角,通过技术上的拆解和密解,带领读者从新的路径和方向重新进入这十篇经典小说,使读者更容易感受到之前阅读中可能忽略的作者的某些精心、用心和会心,重新注目那些之前阅读中擦肩而过的诸多世相和人性“景观”,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作品。

在重新解读经典之外,李浩借此提出一些开拓小说技术探讨空间的议题。比如,阐释《狂人日记》时他提出“概念先行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”,强调写出好小说的重要保障恰在于作者写作前头脑中对某个“想法”的思考,追问和审视,这关乎小说的“魂魄”。

比如,分析《封锁》场景设计和人物腾挪时,一直贯穿对张爱玲小说的总体打量和品评,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小说格局和限度的讨论,指出小说不能止步于对人情世相的表层描摹,应继续“何以如此,非如此不可”的追问。剖析《永远的尹雪艳》时,李浩提出小说“文本自治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,并深入思考白先勇的写作风格和小说格局。同为鲁迅、张爱玲、白先勇的读者,我们也许未必认同李浩所言,但他确实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深入作品的启发性视角与路径。



《匠人坊:小说技法十二讲》可视为对《匠人坊: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》的延续和“升级”。“设计”是贯穿全书的关键词,作者开篇就表明“一直以来我都坚持这样的观点,那就是优秀的(包括全部的经典)小说都是设计出来的,而越是外表上看起来‘天衣无缝’的、水到渠成的小说,越可能是在设计上用功尤深”。李浩深入研究小说创作过程中故事、结构、开头、细节、高潮、角度、情节、对话、景物、人物、深度和结尾这十二个基本要素的“设计”之妙,带领读者进入《红楼梦》《百年孤独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铁皮鼓》《追忆逝水年华》等一个个经典文本中,识别和体悟其中“设计”的心思和技巧以及最终达成的叙事效果,令人惊叹那些读起来天然、浑然天成的优秀小说背后是作者煞费苦心的揣摩、斟酌和巧思,最成功的设计在文本的整体面目上恰是全无技法痕迹、仿佛并不着力。“十二讲”中的观点、论述以及涉及的作品分析,有些曾散见于李浩之前的多篇文学评论中,有些则是他的新发现、新主张,这是李浩关于小说阅读和叙事研究的阶段性梳理、总结和呈现。而对于熟悉李浩小说的读者来说,可以把这些小说技法的探讨,当作是对其小说创作的隐秘注释。

李浩的小说颇具辨识度,行文中总有一个存在感很强的讲述者声音,他的小说志趣不仅要告诉读者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,更在反复强调叙事人的角度、审美和判断,在与人物自在逻辑的角力中产生文本的巨大张力。这种特点在《匠人坊》系列中同样明显,李浩有自己的小说趣味和文学价值观,虽然以“十堂课”“十二讲”为题,但两本书的基本工作立场并不以文学理论完全“客观”“公允”的权威自居,他更强调这是一个小说家的“体验其经验的内部批评”。与单纯的理论批评家相比,李浩的优势在于有充足的实践经验,对于小说创作中的具体难度和限制有切身体会,而且对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和情感因素也了然于心。

这种创作主体与理论批评主体的身份重叠,令李浩在解析阐释作品时更及物、更有效,尤其是他不仅用头脑和理性进行小说“匠法”研究,更着重呈现作品中的文学“心术”,照亮了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和小说技法研究中被遮蔽的角落。当然,过于强调技艺层面,难免忽略作家个体性的艺术感觉,以及作品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意义。但文学作品的多元性与复杂性,正是在理性与感性、技法和灵感、侧身之外与身处现场的动态平衡中求索与完成。

特别可贵的是,李浩在“固执己见”的同时也期待交锋,《匠人坊》系列兼具“片面的深刻”与“对话的姿态”,不仅是与十篇小说作者的对话,与更多国内外前辈作家的对话,也是与同行和读者的对话,甚至是与自己对话。当小说家转身成为理论批评的言说者,他的阐释话语天然带有双重性,既保持创作者的感性的内部视角,同时也生长出批评家相对理性的外部眼光,两种视角和眼光本身也构成对话,这是正是一位小说家在进行文学研究和作品阐释时最大的独特性。对话中的商榷、探讨甚至争执,正在共同完成小说技法“永远在路上”的深度探索。

(作者系河北文学院副院长)

从小说技法十堂课到小说技法十二讲

□金赫楠



上海的文学潮流,从未停歇

——评短篇小说集《潮水涌起之前》

□李 鹏

■评论

短篇小说集《潮水涌起之前》汇集了近年上海作协签约作家的诸多佳作,按照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三个年龄段分类编选,旨在呈现这批青年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果与探索。

书中选录的作品,既展现了上海签约作家的创作水准与个性风格,也折射出新时代上海文学的多元风貌与活力。从现实主义的审视到实验性叙事的尝试,这部小说集不仅可视为上海短篇小说创作的一次巡礼,更是一份向读者呈现当代文学丰富性的诚意邀请。

《潮水涌起之前》是从个体视角透视生活万象。这部小说集的魅力,首先在于作家们对日常细微之处的敏锐捕捉。他们用富有洞察力的叙事勾勒出生活中的隐秘张力,将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提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书写。

赵松《谁能杀死变色龙》开篇便以哲思性的叙事打破日常生活的表象,揭示了身份流动与社会伪装这一深刻主题。这种对身份的追问,恰与郭舒意《见麒麟》形成有趣的对照。如果说赵松笔下的“变色龙”象征着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之道,那么郭舒意笔下的麒麟则触及文化身份与信仰的深层冲突。两者在不同角度,都触碰了“我们是谁”这个古老的问题。在对个体身份的探索之外,郭爽《新岛》转向了一种更具体、更感性的“寻找”。不同于郭舒意对文化张力的关注,《新岛》着重描摹了对归属感的追寻,岛屿化身为记忆、孤独与希望的载体。而这种对意义的找寻,也为小饭《飞在三万米高空的气球》铺陈了情感底色。

小饭以实验性的叙事,在写法上突破了传统的爱情叙事,将日常的情感体验升华为诗意的比喻,使得个人故事获得了更广泛的情感共鸣。“我”与王翔共同策划的这场“太空

计划”是否成功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追寻过程本身带来的成长与感悟。

海派文学的多重面孔,展现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。当个体情感的描摹从私人领域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时,这些作品不仅根植上海,也探向更为普遍的人性命题。在地域特色与普遍关怀之间,这些故事找到了精妙的平衡点,让海派文学的面貌更加丰富立体。

糖匪《亚丁的羊》以太空为背景,拓宽了人们对海派文学的固有认知,作品通过星际对话展现了不同文明间的碰撞。《亚丁的羊》不仅是一篇探索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作品,更像是一场关于宇宙及个体存在意义的冥想。这与三三在《开罗紫玫瑰》中对情感与成长的思考形成对话。两者形式不同,却都以各自的方式展现了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张力:糖匪从文明冲突入手,三三则聚焦于个体在现实中的挣扎与孤独。视线转回地面,王占古《偷桃换李记》用近乎荒诞的笔调,勾画出老年生活的几分无奈与错位。与前两篇作品不同,王占古着力于微观场景的戏剧化建构。正是在这种看似荒诞的叙事中,潜藏着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。

语言的精雕细琢呈现叙事风格的多样与统一。如果说《潮水涌起之前》中的各篇作品主题各异,那么这些作品在语言层面的探索同样精彩。每位作家都在语言的韵律和叙事风格上打磨出自己的印记,而这些差异最终又构成了一种复调式的和谐。

默音《仓山雨日》以宁静而细腻的笔触,描绘了母女间复杂微妙的情感牵绊。其叙事如水墨画般渲染,将对抗与和解的过程描摹得层次清晰。王榕《过水面》借由一道家常食物,为亲情书写注入了悲伤与温柔交织的力量。两者在情感浓度上虽有不同,却都在笔触的细腻和情感的克制上,

有着相似的韵味。不同于两者的日常书写,栗鹿《空蛹》运用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和诗化的语言,拓展了叙事的边界,以“蛹”的意象暗喻青春期的挣扎与蜕变。如果说前两者探讨的是个人与家庭之间的情感,那么《空蛹》则将目光投向了青春、生命乃至更广阔的层面。它在文学语言上进行了颇具个性的实验,也为这组作品增添了别样的色彩。王莫之《为萨克斯写的蓝色情歌》以音乐般的语言,谱写出一段既浪漫又伤感的往事。这曲“蓝色情歌”不仅是为笔下的Y,也是为父亲,为那个远去的弄堂时代,为所有消逝在时光里的记忆与情感,献上的深情告别。

潮水的未来是文学创造的无限可能。《潮水涌起之前》中,每位作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,拓展着文学的边界。这里既有对个体情感的人微体察,也有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层叩问,共同描绘出一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风景。

如果说赵松、郭爽、默音、王占古等人的作品以日常为起点,展现了对现实的深切关注,那么糖匪与栗鹿则借助超越现实的想象,探索着文学的疆域。尽管叙事路径各不相同,但对人与人性的关怀,是贯穿这些作品的共同底色,也将它们的内在联系起来。和前辈作家相比,这一代作家或许更偏爱个体情感的书写,更擅长捕捉日常中的微光。他们的叙述往往是内敛的,但这内敛之下涌动的力量,真实可感。

上海的文学潮流,从未停歇。它始于本土,又超越地域,始终带着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,影响着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。在潮水完全涌起之前,我们有幸站在文学的岸边,倾听这些年轻、成熟、先锋又温暖的声音,共同见证上海文学的当下与明天。

(作者系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